万　　涛

（1904—1932）

万涛，又名万铁民、万诗楷，化名王德，土家族，1904年诞生于四川省黔江县（今属重庆市），家境颇富。少年时人私塾读书。1920年进入县城高等小学堂。1923年7月，赴重庆求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重庆学联负责人张锡畴等积极参加学联、平民社的革命活动。1926年转赴上海，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党中央机关的工作。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这年冬天，万涛受党的委派，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赴湖北贯彻八七会议决议，指导农运、农暴工作。后任鄂西特委委员。

1928年5月，设在沙市的中共鄂西特委机关被破坏，特委书记张计储等八人被害。敌人残酷“清乡”，各县党群组织损失更为惨重。由于失去了战斗指挥部，刚刚兴起的工农武装斗争面临严峻的考验。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万涛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和周逸群等在宜昌建立了鄂西临时特委。不久，经中共湖北省批准，鄂西特委正式成立，周逸群任书记，万涛任副书记。

万涛和周逸群认真总结了农民暴动失败的教训，制订了克服盲动主义残余，恢复、整顿党和群众组织，坚持游击战争等一系列正确措施。他们反复、深入地在党内外进行宣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教育，指出盲动主义的表现和危害，分析产生的根源，说明克服的必要性及其办法。同时，改组各县委，重新登记党员，发展新党员，恢复党的组织。

为了保护党组织和革命力量，坚持长期斗争，鄂西特委决定党组织要保持秘密状态。万涛要求党员以“灰面孔”出现，用各种社会职业作掩护，深入群众，并设法打入敌人内部，开展地下斗争。他还提出，党的会议和活动，应在郊区、农村或夜间进行。各组织间要用单线或暗号联系。“红面孔”（暴露身分）的人，要转移到另外地区工作，以防敌人破坏。他和周逸群一再提醒大家，鄂西游击队的活动区域，没有高山掩护，而且交通便利，敌军调遣进攻非常容易，若无群众的掩护，则非常危险。一定要密切联系群众，扎根于群众之中，做好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建立和发展工会、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

当时，万涛心里十分明白，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要全部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决非一日之事。因此，他和周逸群详细研究了工作步骤，要求特委的同志和党员，坚持把党组织的恢复和整顿同克服盲动主义错误结合起来，纠正急躁情绪和草率从事的做法。万涛还配合周逸群把鄂西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农民普遍开展抗捐抗债的活动，利用洪湖地区河、湖、港、汊密布的有利条件，发展游击战争，使鄂西地区一度低落的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机，特别是农村的群众斗争、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均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形势。

1929年春，鄂西党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党员和党的组织在反“清乡”斗争中得到锻炼、巩固与发展，若干

小块游击根据地不断出现，为进一步发展革命形势，鄂西特委于1929年3月6日，在江陵县沙岗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六大决议，明确规定了游击战争的任务，不仅是为了打仗，更重要的是发动群众。会上，万涛仍被选为鄂西特委副书记，并分管宣传工作。

会后，鄂西特委利用蒋桂战争爆发，敌军兵力减弱的机会，将分散在各县的游击队集中起来，编成游击大队，扩大游击战争。万涛在领导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的实践中，认真探索，研究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的规律，强调游击队要随时根据群众的切身利益，不断改进政治宣传的内容和方法，以教育群众，扩大红军的影响。游击队每到一地，就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谣、标语、传单、口号等形式，宣传革命真理，戳穿敌人的反动宣传，密切了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广大群众踊跃参加游击队，拿起刀枪干革命。

随着游击队的不断发展壮大，万涛加强了游击队内部的思想教育和宣传工作，不断进行民主、纪律等方面的教育。他和特委的同志指导各游击队建立了由士兵轮流担任的巡查队，监督官兵，纠正违纪现象；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公开军需账目；每次作战之后，召开讲评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官兵战术水平。这些制度和措施，有效地推动了游击队的建设。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后，鄂西游击战争迅猛发展。同年5月鄂西游击大队扩编为游击总队，领导群众更广泛地开展武装斗争，使农民武装割据的区域不断扩大。在洪湖、白露湖等河湖港汊交错的江汉平原上，初步形成了一块初具规模的红色区域，成为日后洪湖根据地的雏形。

万涛还以中央巡视员的身分，深入鄂西宜都、宜昌、巴东、恩施等 20 个县，帮助各地恢复、清理党组织，组建游击武装，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及时总结斗争经验在各地推广。他针对一些党员、群众在白色恐怖下动摇退缩的现象，及时指出：“ 决不能被动保守，保守就会失败。没有斗争就没有工作。 ”他了解到部分群众对红军的宗旨认识不清，即指示党组织：“ 我们的宣传工作，既要广泛，又要细致，才能争取群众。 ”他对各县日益兴起的游击斗争，提出了具体要求“ 对于群众的斗争 ,要以武力相助。”他还把带普遍性的问题，及时向党中央报告，提出符合斗争需要的建议，为党中央正确指导全国土地革命斗争提供了经验。

1929 年 12 月，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石首袁家铺召开。会议选举出由周逸群、万涛、段德昌、周小康等九人组成的新的鄂西特委。万涛为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

1930 年 2 月，万涛奉中共中央命令到湘鄂边红四军驻地鹤峰，传达中央和鄂西特委关于红四军东下与红六军会师的指示，旋即担任红四军第二路党代表。他和红四军军长贺龙等领导干部，认真地研究和制定了红四军东下后，怎样开展湘鄂边苏区斗争的计划。他帮助贺龙抽调骨干组成红军独立团，会同各地游击队，坚持湘鄂边苏区的游击战争；建立了以汪毅夫为书记的鹤峰中心县委，领导湘鄂边苏区的革命斗争。之后，贺龙、万涛率红四军东下，经过数次艰难转战，于 1930 年 7 月 4 日，在公安与红六军会师。接着按党中央的决定，两军合编为红二军团。这标志着湘鄂边、湘鄂西两块苏区联成一片，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也标志着贺龙、周逸群、万涛领导的湘鄂西地区的革命战争取得了

巨大胜利。

9月中旬，党中央派邓中夏到湘鄂西，担任红二军团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邓中夏是我党创建初期的重要领导人及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在党内有崇高的威望。但他在湘鄂西期间执行了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在红二军团前委扩大会议上，邓中夏传达和主持讨论了中央关于红二军团渡江南征，配合红一、三军团进攻长沙的指示，并且随红二军团行动。9月间，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领导洪湖、湘鄂边和巴（东）兴（山）（秭）归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仍由周逸群担任书记，万涛担任副书记。

对于红二军团南下，参加攻打中心城市的问题，周逸群、贺龙、万涛等持反对态度，坚持“巩固地向外发展苏区”的方针。万涛提出：红二军团远离苏区，孤军南进，流动作战，失去了根据地的依托，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新区很容易遭敌围攻，而原有的根据地也有遭受损失的危险。应该在巩固根据地的同时，逐步向外扩大。但这些正确意见没有被邓中夏采纳。红二军团渡江后，敌人即发起对洪湖地区的大规模进攻。万涛和周逸群数次致信邓中夏，要求率部速返苏区。贺龙等也表示支持湘鄂西特委的意见。但是，邓中夏也没有接受这些意见。结果正如万涛、周逸群所预料的那样：红二军团南下失利，不仅使部队遭到挫折，而且导致了后来洪湖苏区遭受敌人的严重摧残。

红二军团南下期间，蒋介石派遣 3万兵力，在当地地主、团防武装的配合下，围攻洪湖苏区。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万涛、周逸群等特委负责人，号召苏区党组织“坚决反对逃跑主义，领导群众死力保卫苏维埃政权”，运用游击战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各个击破敌人。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挫败了敌人的第一、二次“围剿”，保存了洪湖革命根据地。

1931年 1 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统治全党。3 月，夏曦作为中央的代表，到达湘鄂西苏区。他随即取消了中共湘鄂西特委，先后成立了以夏曦为首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崔琪为首的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万涛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临时省委常委。这时，远离苏区的红二军团已按照中央的指示，改编为红三军，军长贺龙，政委仍是邓中夏。

1931 年夏天，长江中下游遭受特大水灾，湘鄂西苏区顿成一片汪洋。正当苏区军民奋力抗洪救灾的时刻，国民党反动派向湘鄂西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为了击退敌人的进攻，征服自然灾害，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九师是 1931 年 4 月由留在苏区的少量部队改编，师长段德昌），令第九师二十五团保卫苏区，二十六团向潜江天门一带出击，打击苏区北面之敌徐德佐旅，击破敌人的“围剿”；开展天门、潜江游击战争，并使天门、潜江与监利、沔阳、汉川苏区联成一片。同时要求在能与红三军取得联系时，则与之联系。万涛奉命随军出发，指挥一切。

九师在万涛、段德昌的指挥下，征战不到一个月，消灭了敌徐德佐旅一部及一批团防武装，打破了敌人从北面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使监利、沔阳、汉川等苏区得到了巩固，潜江革命政权也得到恢复，并占领了天门一部分地区。九师还用缴获的大量枪械补充部队，在沙洋组建了二十七

团。

这时，地处湘鄂边界、长江南岸的华容、石首、南县等苏区，仅有一支 300 多人的红军游击队抗击敌人的“围剿”，势单力薄。但由于江水泛滥，红军难以渡江支援，致使敌人得逞于一时，江南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在敌人围攻下遭到失败。

万涛从缴获的敌文件中，得知红三军已进入南漳，遂令部队出击荆门，渡过襄河，转至鄂北迎接红三军回洪湖苏区。9 月 28 日，红三军主力同红九师在刘猴集会师，当晚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万涛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撤销邓中夏的领导职务，红三军回洪湖根据地的指示，改组了红三军前委。万涛担任红三军前委书记、政治委员。

为继续开辟潜江、京山苏区，红三军于 10 月 2 日攻占钟祥，歼敌一部，留枪 150 支组建了钟祥游击队。鉴于钟祥、天门、京山一线敌军力量薄弱，万涛、贺龙率红三军攻下张家港，打通了与洪湖苏区的通道，使新区和老区连成一片。这时，万涛写信给湘鄂西分局和省委，建议迅速派出地方干部协同红三军建立新区政权，并告知省委，已组织潜江、汉川运输队，把缴获的粮食运往遭到水灾的洪湖苏区，以救燃眉之急。10 月 10 日，红三军回到洪湖苏区。

夏曦曾积极参加湖南的五四运动，参加过南昌起义，在湘鄂西苏区为根据地的建设和反“围剿”斗争做了许多工作。但他积极贯彻了“左”倾冒险主义方针，犯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夏曦接到万涛的信后，不仅不予置理，反而颠倒是非，无端地挑起党内斗争。

本来，要红九师出击天门、潜江，迎接红三军回洪湖，是省委和夏曦的决定和指示，万涛正确地贯彻了这一指示，工作成绩是突出的。这一时期，长江南岸的华容等苏区的失败，本和红九师的行动没有关系，但当党中央询问江南苏区失守问题时，夏曦不如实地向党中央报告，竟违背事实真相，把责任全推到万涛及红九师的身上，指责万涛率红九师出击天门、潜江，迎接红三军，是改变军事计划，离开了苏区，导致江南苏区政权的丧失。夏曦还趁万涛等人在前线作战之机，违犯组织原则，于 10 月 8 日发出《湘鄂西省军委会对第三军的训令》，撤销了万涛的红三军政委职务，调后方工作；并给予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陈培荫警告处分。夏曦兼任红三军政委，他还擅自撤销红三军各师部，改编为 5 个大团，由他直接控制。

对于夏曦的错误领导和恶劣作风，万涛等许多干部极为愤慨。在省委会议和省委谈话会上，万涛同夏曦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他还两次向党中央和省委写了申诉报告，说明红九师出击的实际情况，驳斥了夏曦的横蛮指责。

由于万涛等人的坚决斗争，省委重新作出了《关于九师行动的决议》，承认红九师出击是执行了省委和中央分局决定的，江南苏区失守责任不在万涛身上，撤销万涛红三军政委职务是不正确的。党中央也批评了夏曦处理九师问题的一些具体错误，不同意撤销红三军各师部；对地方干部能够批评中央代表（指夏曦），中央表示赞许。但在总的方面，党中央仍支持夏曦，说他到湘鄂西以来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省委也说万涛、段德昌、陈培荫犯有指挥行动迟缓的错误，均给予警告处分，并决定调万涛到地方工作。在这种

情况下，夏曦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承认了错误，后来恢复了红三军各师部。然而，他对万涛等同志耿耿于怀，认为万涛和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等人坚持对他的错误的斗争，是“反中央分局的小组织活动”,甚至用‘反党”反革命’的帽子压制党内的批评，强行贯彻“左”倾错误主张，这就更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党内的争论，实际上没有真正解决。

万涛到地方工作后，担任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宣传部长。他并没有因自己受到排斥、打击而灰心失望，而是以更高的革命责任感做好工作，坚持不懈地同“左”倾错误作斗争。他在《红旗日报》上著文，批评“左”倾路线，分析其根源和危害，提醒苏区军民对新的“左”倾错误要十分警惕。

1932 年 1 月 22 日，中共湘鄂西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监利周老嘴召开。代表们在讨论夏曦的政治报告时，对夏曦到湘鄂西半年多的工作，提出了严厉批评，特别是万涛和省委巡视员潘家辰等同志对夏曦的批评，对建设苏区的正确意见，得到绝大多数代表的赞同。夏曦的处境十分孤立。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较深的同志，不敢坚持原则，在会议上竭力为夏曦辩护，指责万涛等人。还有人把万涛等人对夏曦错误的批评，说成是反中央的小组织活动。命令立即制止这种反党行为，不许用任何理由加以辩护，对反党分子进行严厉批评给予无情打击。到会大多数代表慑于中央的结论，不敢再对夏曦批评了，有的甚至跟着夏曦反对万涛和潘家辰。这样，“左”倾错误路线在湘鄂西全面取得了统治地位。（关向应任红三军政委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纠正“左”倾错误进行了艰苦细致的

工作。）

自此以后，夏曦凭借着王明路线统治下的中共中央的支持，在政治上贯彻“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2年9月，夏曦命令政治保卫局局长彭国材抓捕万涛。彭国材根本不相信为创建苏区呕心沥血、深受苏区人民敬重和爱戴的万涛，会是“反党”、“反革命”分子，拒不执行命令。夏曦大为恼火，将彭国材处死。随即，夏曦将年仅28岁的万涛等一批为创建湘鄂西根据地做出卓越贡献的领导干部杀害于洪湖。

洪湖含悲唱挽歌，荆江碧水祭英灵。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追认万涛为烈士。1957年12月，由国务院拟就的湘鄂西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中，列上了万涛的英名。1984年11月10日，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落成，万涛作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武装的创建者，与贺龙、周逸群等齐名，他的革命事迹在馆内陈列，永远受到人民的敬慕和传颂。

（冉光海　向同伦）

干 国 政

（1907—1931）

干国政，又名祖文， 1907 年 6 月生于湖北省广济县（今武穴市）干仕垸。幼年丧母，父子相依为命。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干昆山先生的私塾中度过的。他勤奋好学好问，一次，他看到两个农民抬着一个肥头大耳的豪绅从石门山过来，就问先生：“那轿中的人也长了脚，为什么要人抬？”先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如今世道路不平！”干国政瞪着眼又问：“那抬轿的人为什么能走呢？”先生说：“你长大就知道了。”

1924 年秋，干国政考入广济县梅川初级中学。他勤学苦读，学业优异。1925 年，大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五卅”风暴席卷全国，继而又是广东省港大罢工，革命形势如火如荼。一天，干国政设法借到一本《新青年》，如获至宝，看了又看，读了又读。他从中找到了儿时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的答案：人压迫人，人剥削人，其根源全在于社会制度的黑暗。从此，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成为梅川中学革命活动中的积极分子。

1925 年 6 月，干国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站在鲜艳的党旗下，向党立下了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

1926 年暑假期间，干国政受党的指示，在干仕地区秘密进行革命活动。至 1927 年 1 月，他先后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干仕支部、黄沙支部、龟山支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共干仕地区总支委员会，发展党员 50 余名。不久，他当选为中共广济县委委员。

1927年春，干国政领导干仕地区农民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土豪劣绅的斗争。他们抓住土豪干朗如、劣绅戴托斋、赌徒王治林、干火如等，令其头戴绿帽、反穿羊毛皮袄，游遍干仕地区，游程达 20 余里。一路上，2000 多农民队伍，高喊“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流氓地痞”、“禁止赌博”的口号。游行后，还把干朗如送到县农协惩办。

为了巩固革命成果，进一步唤醒民众起来革命，干国政亲自在干仕祠堂里办了一所农民夜校，向农民宣传革命真理。听过他讲课的干建坤，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干国政的演讲，娓娓动听，深入浅出地比喻，把自由和真理的种子撒进了干仕地区农民的心田。”在这所夜校里，除他自己讲课外，还请当地的进步知识分子来讲课。一天夜里，他请来干昆山先生。很多老人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干昆山先生讲的“革命”二字：“革者，去也，命者，令也。革命者，就是要革除不合理的命令也。”干国政接近干昆山先生的话题严肃而充满愤慨地讲：“历代帝王将相，为了过花天酒地的生活，横征暴敛，鱼肉人民，这些都应当革除；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等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招兵买马，大量加重人民负担，也要革除。”

干国政创办的干仕农民夜校，像一盏明亮的灯，把干仕地区农民的心都照亮了；像一束火把，将干仕地区农民运动的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肆搜捕共

产党人，革命处于低潮。干国政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战斗在山乡。白天，他活动于崇山峻岭，披荆斩棘，开辟和巩固革命根据地；黑夜，他手提马灯，肩扛猎枪，化装成猎人，走村串户，领导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开展对敌斗争。

在白色恐怖笼罩广济的紧张时刻，干国政领导的干仕地区革命活动始终坚持着，多次拒绝了上级党组织让他转移外地的安排。1929年春的一天夜晚，干国政在干润之家召开党总支会议。他鼓励和叮嘱大家：“我们革命暂时出现了困难，敌人跟得很紧，我们随时都有被捕和牺牲的危险，头可断，血可流，革命骨气不能丢。有共产党领导，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

1929年3月，干国政被选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同年4月，他从省里开会回来，乘民船到仓头埠上岸，在塔水桥饭店被捕，不久，被押往省城监狱。在狱中，敌人用尽酷刑，没有得到他的一个字。

1931年4月，干国政被敌人折磨死于狱中，时年24岁。

（朱泽民　胡金元）

王 子 春

（1900—1932）

王子春，原名王芝田，号钟秀，化名王独清， 1900 年出生在河南省固始县城关镇一户贫穷的家庭里。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正在中学读书的王子春热烈响应，一边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一边奔走于学校师生与城镇居民、商人之中，积极参与罢课、罢市活动。当他得知东关“朱隆瑞德”商号见利忘义，暗地里继续与日商勾结，偷偷地从蚌埠运进 300 多包日本“洋糖”的消息，立即带领学生纠察队赶到徐嘴码头。

码头上，人头攒动，一群码头工人正“一”字排开，一个接一个地从木帆船上往下卸运糖包。两个黑衣衫短打扮，腰扎约三寸宽白帆布板带，一副打手模样的家伙，正在一旁龇牙咧嘴地朝运糖的工人吆喝。不远处站着一个头带白礼帽，身着绸缎长马褂富商模样的人，一手晃动着“文明棍”，一边焦急地叫道：“快，快！再不抓紧干，工钱减二成。”

王子春一个健步冲到船前，转过头，面对大家把双手一伸，拦住了卸船，说：“这糖不能要，这是日本佬毒害我们意志的毒糖！”

一时间，码头上的数十名工人停住了手，都急切地围上来，聆听这帮学生的生动演讲。刚回过神来的富商忙挤进人群，气急败坏地叫：“大伙别听这帮黄毛小子的胡说，这是我花银两刚从安徽购进的上等洋糖，哪里是什么毒糖？大伙

都去干活去！”

“毒糖，就是毒糖！你们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继续与日本佬勾结，定将成为民族的罪人！”王子春一针见血地说。

富商一听此言，忙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银元，先在自己的手中颠得“哗哗”作响，然后显出十分慷慨的样子，分别把手中的银元塞入王子春等几个领头的学生口袋中，说：“有钱买糖是甜的，买肉是香的。”

“你别做梦！不把这毒糖销毁，我们哪也不去！”王子春当即反击道。

紧接着大家纷纷掷出银钱，群起质问富商。自知理亏的富商和两名打手，木然地呆在一旁，眼睁睁地瞧着学生纠察队将 300 余包洋糖掀进河里泡了汤。

1922 年，王子春考入河南公立农业专科学校读书。1925 年，经开封嵩阳中学教员江梦霞（共产党员，后任开封市委书记）介绍，王子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从事学生运动工作。

1927 年，王子春在河南公立农业专科学校毕业。他拒绝了国民党省政府委任的实业厅林业技术科长的官职，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回到固始家乡做发展党组织的工作。不久，王子春担任了固始县立初级中学校长。

同年秋，经河南省委和豫东南党委批准，王子春、蔡仲美等组成了固始城关党支部。同年 10 月，又以城关党支部为基础，建立中共固始县委。经王子春向党组织推荐，蔡仲美担任了县委第一任书记。从此，固始的革命活动在中共固始县委的领导下有了更加广泛深入的开展。

此时，国民党驻固始第十二军第十一师伙同当地反动当

局强征暴敛，鱼肉乡里，作恶多端，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师长颜芝兰，原是豫西土匪出身，固始群众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颜三迷”（官迷、财迷、色迷）。见钱眼开的“颜三迷”把从百姓身上搜刮到的钱财，统统装进自己的腰包，常年不发军饷，搅的官兵们牢骚满腹，兵营大乱。

王子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一方面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税的斗争，大造“反颜”声势；一面指派汪涤源利用与颜的卫兵班、炮兵团中的许多官兵是同乡的关系，加紧对第十一师士兵进行教育、宣传工作，争取策动兵变。

经过一段时间的瓦解工作，颜芝兰身边的部分官兵愿意反戈后，跟着汪涤源一起干。汪涤源随后与他们商定，计划中秋节起义，先打死师长，然后占领县城。

不料这一秘密活动，被师部便衣侦探察觉告发，颜芝兰马上对卫兵们严刑审讯。卫兵们受刑不过，终于道出了计划武装起义等机密。颜芝兰一听供词，惊恐异常，立即下令派出一团兵力将固始初级中学团团包围。

刚巧，王子春不在校内，才算没有落入虎口，并趁机逃出县城，孤身一人前往开封寻找上级组织。汪涤源当场被捕，不久遭颜芝兰杀害。

1928 年，王子春在开封找到了中共河南省委。党组织根据这时形势发展的需要，指派他为省委交通，前往洛阳以店员身份作掩护，立即着手整顿和恢复洛阳党组织的工作。

在白色恐怖之下，许多共产党人遭到国民党的杀害。由于不断出现意志薄弱者的叛变，使得党内的同志人心紧张，有的人对革命前途产生疑虑。王子春到洛阳后，果断召开党组织会议，一面着手清查人员，重建组织，一面对当前局势

作了紧急部署。

一天，蜂厂内一间破旧的仓库里，秘密聚集着洛阳地下党的十多名同志，大家围坐在王子春的四周。

王子春对大家说：“血雨腥风算什么？革命就要流血牺牲，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打不倒，惊吓不倒的！”随后，他又充满信心地说：“在革命之中，失败是难免的事，这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力量仍给反动势力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们知道，有共产党在，今后他们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同时，失败也教育了我们，只有武装革命才能求得解放，我坚信同志们的热血是不会白流的！”

王子春一席铿锵有力的话语，尤如是黑暗中的一阵震天的春雷，顷刻间打消了部分同志对革命前途的疑虑；又如同骤然间吹响的战斗号角，使众人的精神为之一振。

大伙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一起拥到王子春的面前，你一言我一语地争着向王子春要求分派新的工作任务。

不久，中共河南省委指派王子春为省委特派员在豫北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正当王子春信心百倍，忘我工作的时候，反动当局盯住了他。

1932年8月，一个仲夏的晚上，一轮明月高高地挂在空中。月光洒在焦作矿区的大道上，使凸凹不平的山路显得平坦而明亮。

晚饭后，王子春丢下碗，就忙着赶到矿上，去找几个贴心的工友，秘密合计成立工人纠察队的事。回来时，已是月儿偏西，夜深人静。

事情办完后，王子春感到心里一阵轻松，盘绕在心里的一件大事，终于有了眉目。他忘却了一天一夜没合过眼的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